

GAOYANG
ZAWENSANWENJI

高扬杂文散文集

同心出版社

高扬杂文散文集

同心出版社

(京)新登字 21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扬杂文散文集/高扬著.-北京:同心出版社,
1996.2

ISBN 7-80593-177-1

I. 高… II. 高… III. ①高扬-散文-选集②高扬-
杂文-选集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2299 号

同心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34 北京市东单西裱褙胡同 34 号)

冶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字数:86 千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5.00 元

高扬简历

1909年生于辽宁省辽阳县农村，毕业于北京东北大学经济系。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在太行地区任县委书记、特委宣传部长、冀西地委和豫北地委书记。解放战争中，任中共辽鞍中心市委书记、辽阳地委副书记、辽南地委第二书记、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安东省委和辽宁省委民运部长、通化地委书记、沈阳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建国后，任辽宁省政府主席、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局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副部长、化学工业部部长。“文革”中被停职审查。1977年后，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农垦部长、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青年时代喜欢读中外历史和文艺书籍。1982年后至今，发表杂文、散文四十余篇，散见于《河北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求是》和《人民文学》等报刊。

编者的话

今年9月15日，北京市杂文学会召开了高扬同志杂文研讨会。到会的杂文界同仁对高扬同志的人品和文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家纷纷要求将高扬同志的杂文、散文作品汇集出版。高扬同志先是迟疑，后来答应了，使这本书得以出版。

在编辑过程中，高扬同志将文稿的初排校样看了两遍，他对照自己的存稿和报刊登载的文字做了一些修改，并且作了如下说明：

“与我的存稿对照，可以看出报刊发表的文字有增删和改动之处。除文义不通顺和标点不对，由编者和我自己在发表前后作了改正之外，3篇文章的标题有改动：《‘急躁情绪’辩》的‘辩’字原为‘贊’、《提倡领导干部读现实题材的文艺作品》的‘提倡’原为‘建议’，这二者是未经我同意由编者改的，现在恢复了原用语；《扫除形式主义作风》的‘扫除’原为‘辟’，是乔木同志看过原稿向我提议改的。还有《猫捕蝇》和《嶂石岩的今昔》编者分别删去一两句话，弄得文义不通了，我不得不改过来。在《从调查研究说到领导现代化》一文中，编者加了‘胡耀邦、赵紫阳同志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这句话我给删除了。”

我的杂文散文存稿

(前 言)

实在没想到会活八十多岁，而且身体硬朗，耳聪目明。离休了，对我党的建设的研究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日常公务，在阅读文件报刊、静观纷纭世事之余，想到翻翻保存下来的，主要是“文革”结束以来自己做领导工作的文字记录。从吉林省委、农垦部、河北省委到中央党校，我的言论稿都一一翻检过了。翻检中，时时停下来沉思，有自慰，也有感慨；往事如烟，再现了，又瞬即消散了。每天还是照常寝食、阅读，然而却萌发了把写过的杂文、散文汇集到一起的念头。

拖拉多日，搜集整理这杂文、散文稿，凑到一起，竟有 36 篇。其中的几篇，如《从“云顶”工程说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访问马来西亚时与代表团同志谈话)、《给团省委吴振华同志的一封信(谈朝花农民文学社事)》和《谈改进报纸工作》等，乃是正式履行职务的文字，所以放到这里，是因为

它们具有散文性质，后两篇还谈的是文化艺术问题。

汇集起来并不打算出版。现在文艺界的风气是作品庸滥，而争相出版，我不想与俗从违，去追逐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六十几年前，鲁迅的第一本文集叫做《坟》，他在《题记》中说：“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在《野草》的《题辞》中，他说：“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鲁迅竟把他的作品称为“糟粕”和“野草”，我的这些东西哪里还谈得上有出版的价值！汇集而收藏，无非也有“留恋”之意而已。

高 扬

1993年4月6日

写于北京北太平庄寓所

目 录

我的杂文散文存稿(前言).....	(1)
从“云顶”工程说到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
论诬告.....	(6)
“急躁情绪”赞.....	(8)
关于“朝花”农民文学社的一封信	(11)
谈改进报纸工作	
——与河北日报记者谈话记录	(14)
为什么要编写经济文章	(21)
从调查研究说到领导现代化	(29)
介绍一本美学书	
——《新美学论纲》做了建立	
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大胆尝试	(33)
建议党政领导干部读现实题材的文	
艺作品	(37)
漫谈严格训练	(41)
文风小议	(45)
猫捕蝇	(48)

论儿子看不起老子	(50)
建议经济管理干部读	
《资本主义兴衰史》这本书	(54)
水仙的回忆	(59)
《新星》的启示	(62)
我与杂文	(67)
风范长存	(72)
从“分子”说到名家	(77)
谈“精神贵族”的“精神”病	(80)
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前后	(83)
白云遐思	(85)
从“不义而富且贵”说到民族自信心	(87)
英雄与小丑	(90)
杂文质量有待提高	(93)
嶂石岩的今昔	(95)
拣几十粒米引起的沉思	(99)
谈一个博士研究生的自白	(103)
重读《羊脂球》激起的愤怒	(107)
致李伟同志信	(110)
扫除形式主义作风	(114)
《不老的故事》序言	(117)
《平汉线剧团(太行山剧团	
三分团)简史》(前言)	(119)
忧喜参半说杂文界	
——《精英论质疑》序	(121)
杂文终将进一步繁荣起来	

——在南昌全国杂文联谊会上的发言稿	(123)
《凤凰琴》的悲哀	(126)
也来谈潇洒	(130)
《关山复同志文集》序言	(133)
努力扩大杂文的社会影响	
——在第八届全国杂文组织联谊会上的发言	… (135)
《怀念冯伯华同志》序言	(137)
对领导干部应定期进行知识测验	(140)
谈大办喜事	(143)
读《卖书的女孩》感言	(146)
附：感遇诗并序	(148)

从“云顶”工程说到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说 明：

这是一篇讲课稿。

1980年，我任农垦部长时，曾于该年1月3日至14日率6人的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访问结束返国，在广州停留3日，总结出访工作。我有感于团员同志缺乏经济学常识，写了此稿，给大家讲了一个多小时。

马来西亚在距其首都吉隆坡一百多公里的山区叫“云顶”的高山之颠修建了一项休憩旅游工程。从山下有长达几千米的空中缆车直达山顶，在那里建有大饭店、科学会堂、大赌场，还有可划小船的人工湖。我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陪我们去那里参观了半天，大家算是开了一次眼界，因为这之前团员们都是没有出过国的。

看了“云顶”，深有所感，想到给全团同志义务地上一次经济学常识课。

“云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自由流动，以追求高额利润为目的，在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家，为世界富有的旅游者服务，而建设起来的。

它是怎样建设起来的呢？

有了一个代表资本力量的人来创议（此处原写的英文“创议”），做了可行性研究，认为值得下大本钱，结果他计算对了。

要拉关系，找后台（包括资本后台），取得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以及必要的资金。

要有搞高级旅游设施的设计师做出现代化标准的设计。

建筑材料、室内设施，取之于本地，也取之于世界，有些机械装置，只能进口。国家会批准的，因为可征进口税。

这样就建起来了，逐渐扩大规模，提高标准了。也大赚其钱了。

国家—马来西亚政府为什么批准这项工程呢？因为政府可以多收税（营业税及所得税），而且可增加居民就业机会和繁荣市场。

国家为什么不要求创业人不搞“云顶”旅游工程建设，而去投资建设港口，组建航运公司以及兴建大型工业企业呢？这对马来西亚国家现代化不是更为重要吗？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无权提出这种要求，资本，按其本性是自由向利润最高的方向流动的，只

要利润最高，事业又不违法，按宪法，政府就不去干涉，否则那种政府就不成其为代表和保护资本的政府了。

社会主义国家是也要搞旅游业的，但是当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阶段，当国家资金不足，人民生活较为贫困的时候，却不会兴建“云顶”那样的工程。

我国不是许多年不搞旅游业吗？

那是因为我们错误地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连外国的先进技术都不肯学习，简直把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都看成罪恶的象征和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远，哪里还会“开门揖盗”呢？

罗马尼亚在六十年代就搞旅游业，在康斯坦萨大搞建设，我是去看过的。南斯拉夫也搞，能赚取外汇，用之于国家建设，当然应该搞。陈云同志两年前就提倡搞“风景出口”，认为这是国家建设资金一项重要来源。

但是社会主义搞旅游业要服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和长远规划。国家不应该，也不会拿出超过适当比例的资金用之于旅游业以致影响工业、文教、科学等项大事业的发展。即使投资于旅游比上述办工业赢利又多又快，也不该那样去办。这也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决定的。只看利润来得快而且多，人力物力过多集中到旅游业，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倾向，应该予以纠正。

两种社会制度比较起来：

资本主义制度：资金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为

追求最高利润而自由流动。我们看作不合理的事，在它那里是天经地义的。

社会主义制度：资金集中在国家手里，为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而有计划按比例地使用。计划不周，浪费资金那是工作的失策，而非制度本身的弊病。如盖楼堂馆所和高干宿舍过多从来即认为不合理。

如果把地球上的人类社会做一个整体来看，在相当多数人生活贫困的条件下，搞“云顶”那种旅游工程只供少数人享乐，系属极大的社会浪费。过去说荒淫的皇帝“牺牲天下，以奉一身”。像“云顶”那样的工程，其性质同为帝王修建“离宫别馆”，我们修别墅的浪费相似，不过时代不同，修建目的为了赚钱，服务对象也有改变罢了。

资本主义国家自称是自由世界。从两种意义上说它确实是自由世界：资本有流动的自由、追求高额利润的自由，资本家有享受一切人间快乐的自由；而丧失了一切财产，除了能劳动的两只手（现在再加上一个脑袋）别无所有的人则只有被剥削的自由，挨饿的自由。现在资本主义也进步了，再加上有了吃剩饭的自由，因为资本主义的总管理处——资产阶级政府怕饿鬼造反，不得不搜集各户资本家的剩饭来做“盂兰盆会”，进行施舍——搞劳动保险政策。而这也是一百多年饿鬼们——失业工人不断造反争来的。

我们多年“闭关锁国”，除了造成经济上停滞，

技术上落后等严重恶果以外，还有一个同样严重的恶果，就是造成多数青年人的无知，他们以为所谓自由世界真是“西方极乐世界”，对那里盲目向往。门户开放之后，我们不但宣传工作上要对资本主义的光明面和黑暗面，以事实为据来进行解剖，而且对有机会出国的青年人不仅要引导他们去看“云顶”，也要引导他们看贫民窟，去看资本主义乌云遮盖下，丧失了劳动条件的无产阶级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国家虽然穷，但是有“铁饭碗”，包括农民，所有的人在国家困难条件下都管饭吃。这是资本主义同我们不能比拟的。而等我们生产进一步发展了，人民生活好了，我们也要造自己的“云顶”，使原来是穷孩子出身的人们也能坐“上天梯”——缆车，到比那“云顶”好得多的长白山天池之类的地方，去欣赏天造地设的美景。

论诬告

诬告历来为公正舆论所不容，而且是违法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中利用大字报、小字报、批判会、审讯会来揭发、检举、控诉、清算“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叛徒”或“反党分子”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理直气壮”地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过去近六年了，在河北“遗风未泯”，有些派性严重的人，仍然把诬告做为制造思想混乱和组织混乱，以便混水摸鱼的斗争手段。

现在进行诬告和“文化大革命”那时候不同，是在钻空子。有些诬告，同人们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检举揭发坏人坏事、控诉坏干部“鱼目混珠”。诬告者匿名，或者署假名，又同检举揭发控诉者怕打击报复不愿署名，一时分不清楚。这样，领导机关要反对、制止诬告，未免“投鼠忌器”，使诬告者往往只费“八分钱”，就够让你领导机关“忙半年”。于是，诬告成风，它影响党内团结，加剧派性分歧，涣

散干部斗志，妨碍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许多正直干部早已疾首蹙额，思有以纠正之，清除之。

“投鼠忌器”是因为老鼠钻进可贵的容器里。只要不让老鼠钻进容器，就可以人人喊打，而且动手打了。因此我想，反诬告的办法是：（一）严肃处理构成打击报复的案件，使检举揭发控告者减少顾虑；（二）教育动员检举揭发控告者勇于在信件上签署真名实姓，表明自己愿负政治责任；（三）领导机关对匿名信和查系假名信进行分析判断，区别情况，或者不予置理，或者转被告所在的上一级机关备查。如果认真对待，估计不会由于没有“忙半年”，竟致“网漏吞舟之鱼”。可是这样，诬告者花的“八分钱”或者几个“八分钱”，就枉费心机了。

现在的诬告风既然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鼠们吱吱叫起来的，关心端正社会风气的人们，实在应该齐心协力把它们赶上街，让谁都看明白它们是鼠辈！

（原载 1982 年 8 月 21 日《河北日报》）